

後危機時期中國經濟轉型與國際參與

鄧玉英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

摘要

後金融危機時期全球經濟與貿易復甦緩慢，中國因其龐大消費市場及外匯存底成爲眾所矚目的焦點，然而中國是否能在出口減緩下順利由「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的經濟成長模式轉型持續擴大內需、穩定就業，仍需觀察其內部五項重要議題的發展：（一）政府振興經濟政策的初期效果以及未來風險，（二）貨幣金融手段的操作與金融試點改革評估，（三）經濟成長趨緩的硬著陸風險，（四）人口結構轉變與人口紅利衰減，（五）城鎮化與所得水準提升。此外，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經濟結盟亦是中國在後危機時期提升國際政經影響力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中國、經濟成長模式、經濟轉型、區域整合

壹、前言

歷經全球金融海嘯、歐債風暴迄今，國際局勢逐次轉變，二戰以來主導世界政經發展的歐美國家備受衝擊，至今仍汲營於國家發展之路的思索，而中國近二十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也放慢了腳步。儘管如此，因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形成而崛起的中國，在此時被寄予應擔負更多國際職責，「made in China, sold in China」的期待甚囂塵上，生產鏈效應讓中國經濟成長的數據成爲東亞景氣復甦的觀測指標。然而，面對國際市場萎縮，出口下降的壓力，中國是否能順利由「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的模式轉型來維持經濟成長、穩定就業衝擊是本文亟於探討的核心議題。

自 1979 年鄧小平主導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 1982 年十二大的「計畫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1987 年十三大的「翻兩番到三步走」、1992 年十四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7 年十五大的「宏觀調控」、2002 年十六大的「三個代表」¹、2007 年十七大「統籌城鄉發展」到 2012 年十八大的「居民收入翻番」，經濟決策的實施目標都是以刺激成長爲首要任務，見圖 1。根據世界銀行 WDI 資料庫數據，1980-90 年、1991-2000 年、2001-10 年中國 GDP 平均成長率分別爲 9.3%、10.1%、10.49%。但持續快速的經濟成長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正面臨增長壓力，經濟轉型已作爲中國 2020 年達到小康社會，由全面建設到全面「建成」的推進戰略，經濟成長模式轉型遂爲中國政經研究的重要議題。

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決策模式可分爲兩部分：行政程序上，由中共中央經濟會議訂定經濟發展目標，國務院直屬機構及部門分責執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規劃、統籌、協調政策計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負責綜合性政策研究以及決策諮詢；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提供諮詢與建議；國務院所屬各相關部門主事計畫規劃、研究與執行；中國社會科學

¹ 「三個代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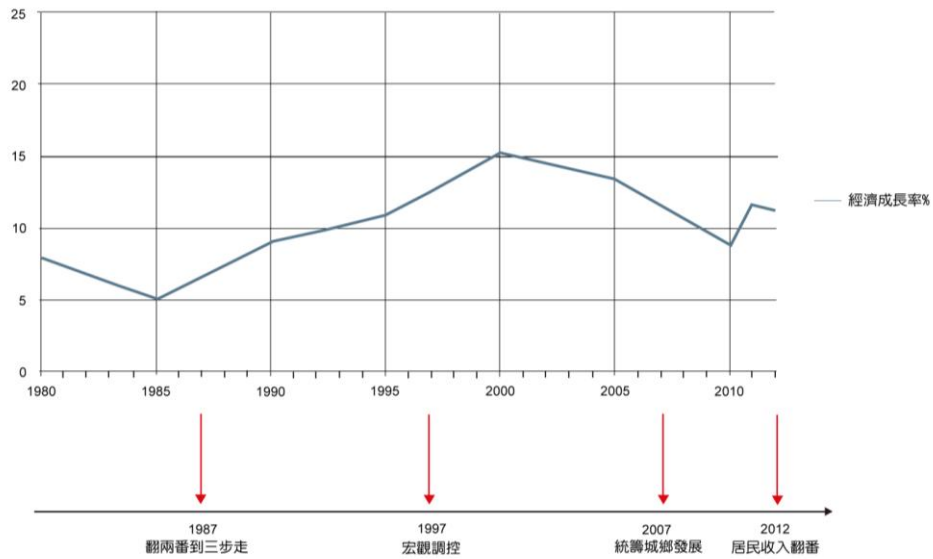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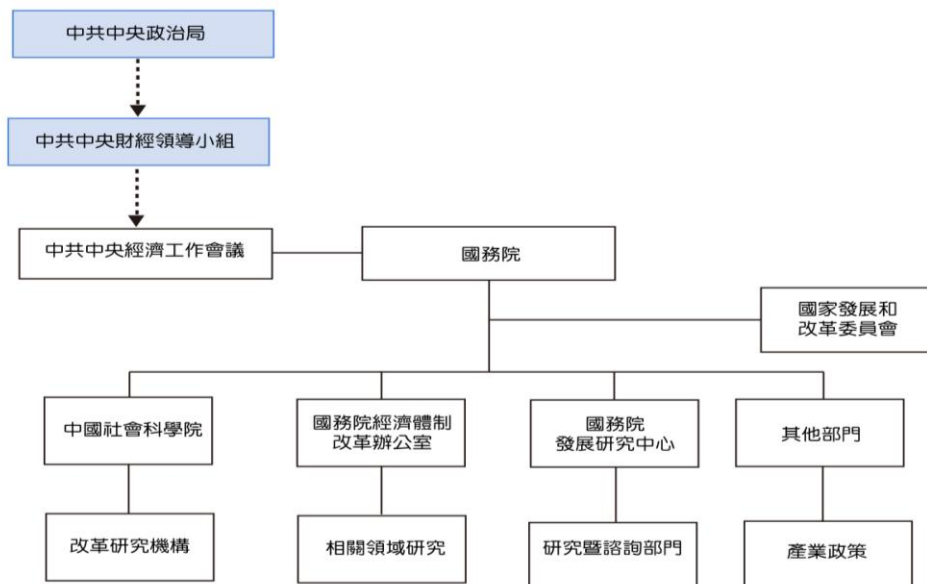


圖 1：中國各階段經濟決策目標



註：實線部分為中國經濟決策的法定程序架構與權責機構，虛線部分為則為經濟決策的實際定向與決議核心。

圖 2：中國經濟決策架構

院進行學術及綜合研究。然而，實際的經濟決策核心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該小組又依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作為經濟決策的方向。圖 2 為中國經濟決策的架構。由「投資、出口」成長模式到「消費、內需」成長模式的經濟轉型，正同時面臨國際政經局勢發展以及中國內部穩定成長的挑戰。

貳、中國經濟成長模式之轉變

家計單位（民間部門）消費、固定投資（企業部門）、政府支出、淨出口（國際市場）是構成 GDP 的四個部份，政府當局在面對景氣循環時，為穩定物價、保障就業而實施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雖是干預手段，然而此一凱恩斯理論的應用，在 1930 年代的景氣衰退以及 1970 年代的兩次能源危機都及時地紓緩經濟衰退。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襲擊以來，這兩個政策手段也廣為各國政府交錯使用，財政政策的施行以刺激民間消費、廠商投資和政府公共支出為目的，中國 4 兆人民幣的振興經濟方案、十二五新興產業發展等施行至今，已可初步檢視成效。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 2012）數據，2006 至 2012 年，中國出口年增率分別為：27.2%（2006）、26.0%（2007）、17.2%（2008）、-16.0%（2009）、31.3%（2010）、20.3%（2011）、7.9%（2012）。民間消費佔 GDP 比例分別為：38.0%（2006）、36.2%（2007）、35.6%（2008）、36.3%（2009）、35.1%（2010）、34.5%（2011）、36.3%（2012）。數據顯示，出口成長減緩，出口佔 GDP 比重由 2006 年的 39.1% 下降至 2011 年的 28.6%，民間部門消費支出佔 GDP 的比重亦波動下降。過高的儲蓄率是民間消費無法提高的重要因素。

下列三項是影響中國經濟「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成長模式轉變的指標性動力（driver）：

一、**城鎮化進展**：中國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由 1978 年的 17.92%，到 1995 年的 30.0%，2009 年的 46.6%，2011 年的 51.27%。（中國國家統計局，2012）都市化發展是加速基礎建設、提高工資率、帶動投資消費的重

要推力，但隨之而來的房地產市場盛衰亦可能引發通貨膨脹、抑制消費。
(Wang, 2010)

二、**基礎建設支出**：2008 年底中國以財政手段擴大公共投資，2010 年經濟成長率回升，但水可載舟亦能覆舟，投資固然刺激成長、增加就業，卻也造成利率上升、排擠效果等負面影響。另方面的現象是，中央鼓勵地方投入基礎建設，地方政府向國有銀行借貸，龐大的借貸需求佔 GDP 比重過高（見附錄一）勢將衝擊金融體系的穩定度，不利長期經濟發展。

三、**民間部門消費**：根據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產值佔中國經濟總額 45%，市場壟斷、操控，2008 年以來「國進民退」的現象不但阻礙市場經濟私有化的發展，更無法藉由所得再分配來提升民間部門消費。研究中國法律的學者 Lubman（2012）稱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是每個國有集團控股公司的主要股東。

後金融海嘯時期國際需求下降，爲了持續成長，中國以推動城鎮化發展來增加城鎮居民比重，借以提高所得，刺激民間部門消費，並且在城鎮化過程中擴大基礎建設支出以因應城鎮人口增加的需求。因此，環環相扣的城鎮化進程、基礎建設支出、民間部門消費可視爲中國經濟「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成長模式轉型的重要觀察指標。

爲進一步了解中國經濟成長模式的轉變，藉由圖 3 分析架構來探討影響中國經濟成長模式轉變的五項重要議題，分別是：政府振興經濟政策的初期效果以及未來風險、貨幣金融手段的操作與金融試點改革評估、經濟成長趨緩的硬著陸風險、人口結構轉變與人口紅利衰減、城鎮化與所得水準提升。

一、振興經濟政策的作用與風險

2008 年中國提出總額高達 4 兆人民幣（約 5,850 億美元）的振興經濟方案，包括政府支出、企業投資、民間消費三部門；政府支出主要項目爲科技應用、交通建設、三農建設以及醫療照護；企業投資項目爲金融系統、產業創新；刺激民間消費的主要政策是家電下鄉。（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財政經濟委員會，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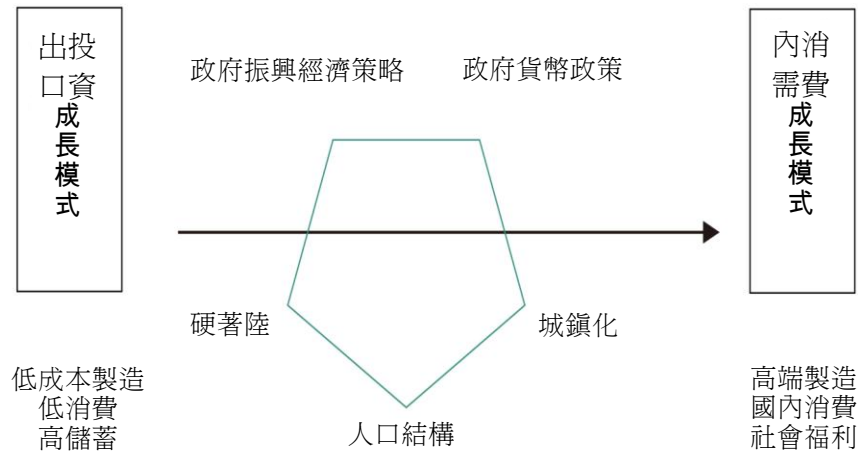


圖 3：中國經濟成長模式轉型架構分析

由於振興經濟方案中央只提供 30% 的資金來源，其餘皆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自行籌措，因此地方政府透過其所成立的融資平台公司募集資金，帶動銀行信貸投資熱潮，然而部分資金卻被導入房地產市場及金融商品，槓桿操作以獲取暴利的情況提高了銀行逾放和壞帳劇增的風險，三角債問題也隨之升溫。從表一 2010 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可發現地方政府與融資平台公司龐大的債務壓力。根據聯合國經濟合作組織的標準，企業負債佔 GDP 比重超過 90% 即進入金融危險狀況；2011 年中國企業負債佔中國 GDP 比重 107% (李迅雷，2012)。為了避免資金浮濫衝擊金融市場，配套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安全監督系統是穩定經濟必要的手段。

另一個現象是 2011-12 年企業庫存不降反增，國際市場需求以及國內消費未如預期成長，民間部門的投資也因下一波大規模的新刺激經濟政策是否推出而趨保守，面臨持續增長的瓶頸，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儼然存在。中國大規模的公共支出造成地方政府向國家所屬銀行借貸的金額擴大，將刺激未來中國融資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以出口為主的國營企業迅速坐大的現象，造成了「國進民退」的企業生態，影響家計單位所得的提高，對國內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劉金全等，2012)

表 1：2010 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構成

單位：億元人民幣

舉債主體類別	三類債務合計		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	
	債務額	比重	債務額	比重
融資平台公司	49,710.68	46.38%	31,375.29	46.75%
地方政府部門和機構	24,975.59	23.31%	15,817.92	23.57%
經費補助事業單位	17,190.25	16.04%	11,234.19	16.74%
公用事業單位	2,498.28	2.33%	1,097.20	1.63%
其他單位	12,800.11	11.94%	7,584.91	11.31%
合 計	107,174.91	100.00%	67,109.51	100.00%
舉債主體類別	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		其他相關債務	
	債務額	比重	債務額	比重
融資平台公司	8,143.71	34.85%	10,191.68	61.04%
地方政府部門和機構	9,157.67	39.19%	0.00	0.00%
經費補助事業單位	1,551.87	6.64%	4,404.19	26.38%
公用事業單位	304.74	1.30%	1,096.34	6.57%
其他單位	4,211.75	18.02%	1,003.45	6.01%
合 計	23,369.74	100.00%	16,695.66	100.00%

資料來源：中國審計部（2012）。

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的「朗潤預測」²（2009Q1-2012Q3）以及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的季度預測（2012-13）都指出，中國經濟正面臨減速調整，經濟刺激措施具有時限性，不應長久施行，為了避免經濟失衡擴大、政府債務提高、通膨率上升，政府不宜再度啓動財政刺激計畫（盧鋒等，2012；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2012）。

²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以邀請中國各主要宏觀經濟經濟分析預測機構參與，進行中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季度預測，名爲「朗潤預測」，朗潤園是該中心所在的北京大學校區。

二、貨幣政策的操作與評估

「溫州試點」的金融改革是中國踏出民間金融發展的第一步，國務院除了明確將監管責任由中央轉移到地方政府手上之外，更鼓勵建立新型金融組織、投資基金相關機構、境外個人投資等三項金融機制，以多元金融體系提供有力經濟發展的金融環境，並為未來中國金融改革提供經驗。(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2) 此一決策的考量是：溫州民間信貸與匯兌已累積近 30 年的發展，2010 年振興經濟政策之後的資金緊縮，在借貸困難下藉由民間金融操作來滿足企業和民間部門的資金需求，不僅有利於金融服務的發展，更可刺激國有金融的競爭。

然而，為了鼓勵民間部門消費，中國在金融海嘯發生以來首先以汽車下鄉補貼政策及「以舊換新」購買節能減碳家電，並恢復五一黃金周假期、消費月等短期措施來提升內需市場 (Lee, 2012)。然而積累的龐大外匯存底以及貨幣超量發行也許能沖銷人民幣匯率緩升的壓力，但通貨膨脹率過高和工資上漲等問題都會影響長期經濟成長轉型的進程。

三、硬著陸的潛在風險

硬著陸指的是以強力的財政貨幣政策一次性、較短時間內將通脹率降到正常水準，效果立竿見影，在社會大眾尚未充足預期前就已經達到政策目的，但是卻犧牲國民收入、經濟波動等可能產生的副作用。為保持經濟持續成長，提高國內消費以因應國際市場萎縮，中國在 4 兆人民幣振興經濟方案之後，採貨幣緊縮以穩定通膨，然而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國內需求和消費不見顯著成長，而儲蓄率卻居高不下，無法支撐經濟成長的風險，因為短時間內經濟增速放緩的硬著陸³，不僅可能造成國內資金外流，也會對依賴中國需求而帶動出口成長的貿易夥伴造成嚴重影響，例如台灣、日本、韓國、澳洲等國家 (溫芳宜，2013)。

³ 根據資產投顧機構 MarketWatch (2012) 的調查顯示，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中國政府有意放慢經濟增速，抑制房地產市場過熱以保障社會大眾住房需求，因此即便是溫家寶所稱預期 2012 年經濟成長調降至 7.5%，也不能稱之硬著陸。

2006-11 年中國國內儲蓄佔 GDP 的比重都超過 50%，相較於已開發國家 2010 年平均近 17.53% 的水準高出許多，振興經濟方案拉動經濟成長的效果是來自於地方基礎建設的大規模投入，民間企業在生產要素提高和庫存增加的壓力下，投資保守，而靠地方投資拉動的經濟成長卻為長期持續發展埋下了不確定因素：地方政府債務以及影子銀行體系（shadow banking system）⁴ 的擴大，並成為中國內部金融危機的隱憂。（陳彥斌與姚一旻，2012）因此國際評等機構穆迪雖然指出中國應該已避開硬著陸，但非銀行信貸的增加卻為金融體系帶來更大的金融風險，亦將影響經濟持續成長。

四、人口結構轉變的壓力

過去 30 年，中國經濟成長得利於相對低廉的生產要素投入，廉價的勞動力更是吸引產業升級國家的企業廠商移入，此項「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⁵ 在中國人口結構轉向高齡化社會後，已來到了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過度階段，亦即「路易斯轉折點」(Lewis Turning Point, LTP)。（張曉波等，2009）亞洲開發銀行預估，中國、台灣、泰國、越南將在 2021-30 間出現人口紅利負數（ADB, 2011；見附錄二）。國際貨幣基金的研究則預估，中國在 2020-25 將進入 LTP，提高工資率、轉向資本密集型生產、鬆綁一胎化政策或可延緩人口紅利的耗盡（Das & N'Diaye, 2013）。中國人口經濟學研究也提出，2015 年中國很可能步上日本 1990 年歷經快速成長高峰的後塵，隨即陷入漫長的經濟停滯（Cai & Wang, 2005）。

當然，觀察經濟成長與人口結構的相關性是否能簡化為：以扶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指標，仍需要更嚴謹的研究，例如，生產要素投入的轉變由

⁴ 影子銀行不屬於銀行機構，卻藉由衍生性金融產品的設計、銷售，而成為次級貸款者和資金市場的媒介，例如投資公司、私募機構、對沖基金等，以槓桿操作獲利，對金融體系的穩定度具有相當大威脅。

⁵ 人口紅利再經濟學的意涵是指因為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伴隨而至的經濟成長效應。人口紅利通常發生在人口過渡時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晚期，此時因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撫養的青幼年人口減少，人口組成中，需被撫養的 14 歲以下少年與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 15-64 歲勞動人口比例（即扶養比：扶老比與扶老比之和）小於 50% 便稱之為「人口紅利」。

勞動力投入轉向制度建構 (聶輝華、鄒肇芸, 2012); 技術投入、創新; 高齡化產業開發; 社會福利安全體制等都待進一步觀察, 才能確定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五、城鎮化發展有利於所得水準的提升

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是中國不均衡發展策略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在人口紅利驅動經濟快速發展時期, 即便受制於戶籍制度, 農民工仍有強大意願往城鎮地區發展, 但隨著出口緊縮, 經濟成長放緩, 加速城鎮化不僅能提高勞動生產率, 縮小所得差距, 更能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帶動新一波的經濟成長 (Wang, 2010)。但加速城鎮化發展的同時, 也必須正視影響消費的外部因素, 而這些外部因素亦是高儲蓄率的主要原因: 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給付等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民間消費借貸困難, 以及教育支出過高等都是影響民間消費的根本問題。

表 2: 2004-2011 年中國農村、城鎮居民消費

年	項目	全部居民 (億 RMB)		全部居民 (年成長率 %)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2004		63,833.5	17,550.6	46,282.9		
2005		71,217.5	19,228.2	51,989.3	11.57	9.56
2006		80,476.9	21,106.7	59,370.2	13.00	9.77
2007		93,317.2	23,913.7	69,403.5	15.96	13.30
2008		111,670.4	27,677.3	83,993.1	19.67	15.74
2009		123,584.6	29,005.3	94,579.3	10.67	4.80
2010		140,758.6	31,974.6	108,784.0	13.90	10.24
2011		164,945.2	37,394.6	127,550.6	17.18	16.95

註: *全部居民年成長率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後之結果。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 (2008, 2012)。

2012 年中國城鎮人口的比例為 52.52%, 約計 7 億 1,182 萬人口, 農村人口為 6 億 4,222 萬人, 2011 年至 2012 年城鎮人口增加 2,103 萬 (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3)。移居城鎮首要面臨的醫療、住房、教育等問題對社會發

展存在相當大的壓力，如果推動城鎮化而沒有同時改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人口移入城鎮不但無法達到縮短所得差距的目標，恐將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例如城市中小學就讀的潛規則：支付龐大的入學贊助費。所以觀察中國是否能藉由推動城鎮化來提高民間部門的薪資所得，並進而增加消費、帶動經濟成長，就必須進一步觀察產業發展所創造的勞動力市場是否能創造就業、增加所得。

參、金融海嘯以來中國的國際參與

2008 年以來歐美各國經濟受挫甚重，歐債危機讓歐盟成員國不斷提出重新思考歐元未來的前景，但另一方面在東亞地區卻更積極地展開結盟談判，中國與 ASEAN 國家、日本、韓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計畫再次將中國推向國際政經舞台，這也使得世界各國在全球市場爭奪下，聚焦中國的經濟發展。

一、國際資金流動的變化

中國快速經濟成長的助力來自於國際資金的投入以及出口擴張，比較日本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顯示，1980 年代初日本對外投資以及外資對日本投入的差距，見表 3，擴大對外投資是日本成長的動力。反觀過去三十餘年，外資對中國的投入不僅是資金的轉移，亦是產業基礎、技術引進的關鍵（林吉琳與翁嘉禧，2011）。

但隨著國際資金進入減少，中國在此經濟成長模式轉型的階段，是否能改變過去低成本製造的經濟結構，提高技術創新、增加高階生產、自創品牌，才能為經濟成長模式轉型提供有力的產業環境。2012 年中國製造業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為 19.8%，但中國製造業研發的投入只佔全球製造業研發的 3%，山寨扶正自創品牌需要更大技術掌握，才能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2011 年中國 R&D 的投入佔 GDP 比重為 1.84%，台灣同年的 R&D 投入佔 GDP 比重為 3.02%（行政院主計處，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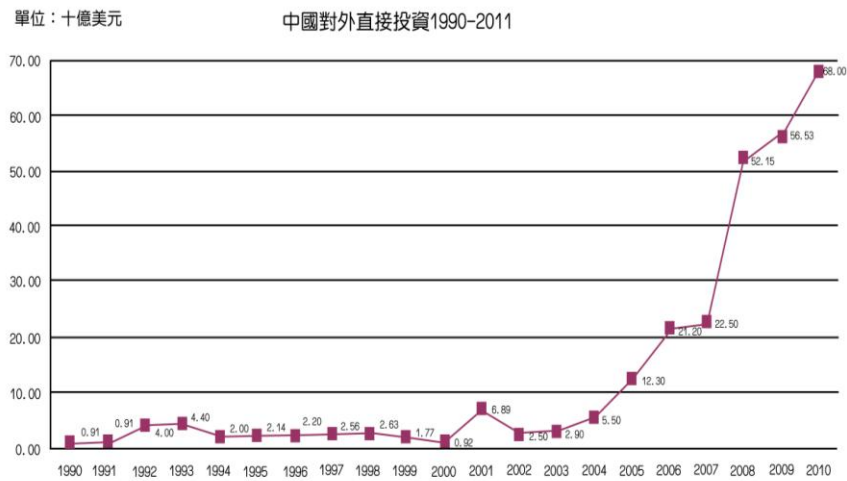
表 3：國際資金流入與輸出

	FDI inflows/ FDI outflows	FDI outflows/ FDI inflows
日本 (1981)	0.04	25.8
中國 (2004)	33.6	0.03

資料來源：Huang (2005)。

但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投資亦自 2004 年始急遽增加，批發零售業、採礦業、交通運輸與倉儲業是前三大的海外投資項目。圖 4 是 1990 至 2011 年中國對外投資的狀況，由圖 4 可看出自 2003 年至今中國對外投資大幅增加。透過跨國購併的方式，中國積極並且有計劃地投資海外自然資源，除了工業發展的能源需求因素之外，礦產資源的有限性蘊藏極大利益。2011 年中國三峽總公司敵退德國和巴西企業，收購葡萄牙電力公司 (edp)，背後的利益是風電資產和巴西市場。

引起國際關注的另一項中國對外投資趨勢是：全球企業在中國子公司反購併其海外母公司。2011 年中國 Yahoo 與阿里巴巴覬覦購併美國 Yahoo，引人側目。2010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團與大慶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購併汽車大廠 Volvo，中國資金入注並管理經營歐美全球企業的案例或將持續增添。(蕭興志等，2012)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 (2012)。

圖 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1990-2011

由於中國以走出去戰略作為對外經濟外交的重要政策，而金融海嘯後中國也藉由廣大的內需市場及持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其國際政經地位，但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在海外的經營固然可以配合當地市場運作而受規範，但企業海外經營所追求的商業利潤，逐漸與國家經濟利益脫鉤，甚且中國企業間的海外競爭也關連國內的權力結構（劉智賢，2011）。此一現象是否與中國貪污腐敗的官僚體系，透過中國在外企業將資金大量外移，亦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中國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利益

東亞地區的發展由日本引領四小龍經濟起飛，緊接著東協四小虎（ASEAN-4-tiger，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加入生產供應鏈的產業分工，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使得四小虎的經濟發展遲滯了近三年，在此期間，中國在區域競爭中吸引大量外資，產業發展迅速，為了提升 ASEAN 區域內經貿合作，2003年 AFTA（ASEAN FTA）成立；2010年「ASEAN+China」啟動，中國廉價製造業產品開始大量進入中南半島國家（吳寄南，2012）。

表 4：2007-2011 中國對 ASEAN 國家貿易概況

單位：萬美元

	進 口	出 口	總 額	佔總貿易比重(%)*
2007	10,838,583	9,414,679	20,253,261	9.32
2008	11,700,291	11,431,677	23,131,969	9.03
2009	10,674,897	10,625,686	21,300,582	9.65
2010	13,815,981	15,470,072	29,286,053	9.85
2011	19,301,809	17,007,061	36,308,870	9.97

註：*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後之結果。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08, 2010, 2012）。

ASEAN 六國自中國進口貿易額佔 ASEAN 進口總額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2% 增加到 2003 年的 8%，2011 年則達 13%。而 ASEAN 對中國出口佔

其出口總額的比重亦逐年提高，1993 年佔 2%、2003 年佔 6%、2011 年佔 10% (ASEAN, 2012)。

1992 年亞洲開發銀行啓動大湄公河計畫 (Great Mekong Sub-regional, GMS)，委員會成員由 1995 年的泰國、寮國、柬埔寨、越南，1996 年緬甸加入，該年「東協—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ASEAN-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MBDC) 形成，中國、南韓、日本應邀加入。

中國與 ASEAN 的經貿互動架構涵蓋了「ASEAN+China」以及連接中國西南地區至中南半島的黃金走廊地帶。有別於 1991 年聯合國開發總署爲穩定東北亞區域安全爲主要考量的的圖們江開發計畫 (Great Tumen Initiative)，AMBDC 次級區域組織的經濟利益持續吸引外資投入，中國更挾其經濟優勢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扮演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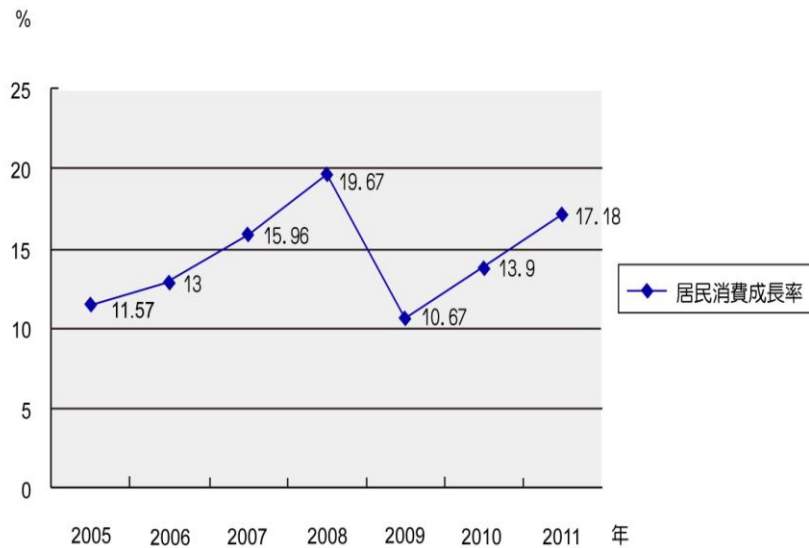
2004 年中月兩國簽署聯合公報，啓動「兩廊一圈」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昆明—老街—河內—海防—廣寧」經濟走廊、「南寧—涼山—河內—廣寧」經濟走廊，以及環北部灣經濟圈的雙邊合作，中國經由廣西、雲南和海南島直抵月南邊境及港口，建立中國與其他 ASEAN 成員國的海陸通道。2009 年寮國成立金三角經濟特區，人民幣爲通用貨幣，中資企業在此種植甘蔗、橡膠。就實際的經貿利益與國際外交而言，中美兩國透過「ASEAN+N」、TPP 在東亞區域結盟的競爭更劇烈。中南半島三個新加入 ASEAN 的國家在政治立場上，柬埔寨、寮國被視爲較靠向中國的一方，而越南則在「ASEAN+China」與 TPP 的政經關係中似乎更靠向美國。

中國「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成長模式的轉型將有利於其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力，特別是自 ASEAN 的整合機制上更能紓緩中國內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壓力，建構雲貴西南地區向外連結的發展。

肆、中國經濟未來兼結語

根據 2013 年中國第十二大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報告，十五規劃以來，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爲主線的執行情況仍存在諸多風險，結構調整速度較慢、產能過剩、財政金融潛在風險加大、所得分配、

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問題都會影響社會經濟穩定，因此提出 2013 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措施，包括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的稅制改革，擴大對“三農”、小型微型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融資，持續擴大內需、刺激民間消費，改革戶籍制度和社會管理體制以推進城鎮化。（人大財經委員會，2013）圖五為中國近年居民消費成長概況，雖然振興經濟方案刺激提升民間消費，但如前所述，受制於國際景氣復甦緩的外部因素影響，居高不下的民間儲蓄率以及城鎮化的進展都是影響中國「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經濟成長模式轉型的重要因素。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

圖 5：2005-2011 中國民間消費成長率

面對國際景氣復甦緩慢，歐債疑雲混沌未明，中國是否持續經濟成長將受經濟成長模式轉型成敗所左右，幾個關鍵因素將影響中國未來情境的變化：首先，國民所得水準的提高不僅仰賴工資率的改變，物價、住房、都市化發展等都是刺激民間部門消費的重要因素。再者，大型國營企業與國家控制是否能逐漸退出市場經濟運作，擺脫國營企業市場壟斷，民營化發展才能提高民間消費與投資（陶冬，2013）。

本文以上述影響中國「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成長模式轉變的國內因素，以及外部國際經濟景氣興衰交互作用，推演出中國經濟未來的四個可能發展途徑 (possible scenari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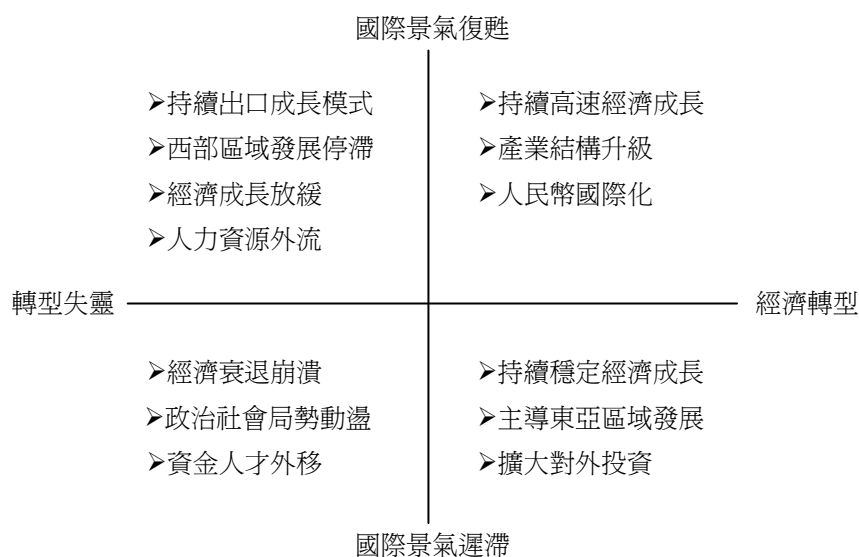


圖 6：中國經濟未來可能發展途徑

情境一，快速經濟成長：成長的動力來自於中國都市化程度加速進行，積極投入各項基礎建設，吸引產業投資，促進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國民所得提高，民間消費增加；另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因歐洲穩定機制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 緩解歐債危機壓力，全球景氣復甦，中國出口與投資成長顯著，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流通增加。

情境二，經濟成長穩定緩慢：中國新一輪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增加，民間就業提升，但美國因逢大選，經濟政策以保守穩健為要，歐元區因擰節政策，抑制消費，影響就業與所得，景氣復甦遲滯，中國因而在東亞各國亟待尋求經貿合作夥伴下，以購併國際大廠為手段，擴大對外投資，成為 ASEAN+N 的關鍵主導。

情境三，歐美政經穩定發展，國際景氣復甦，市場需求增加，但中國因財政支出氾濫，衝擊金融體系，內需萎縮，經濟成長模式轉型失敗，只

能調降工資率以爭取出口生產，區域發展失衡再度擴大，資金抽離西部地區，國際及中國高階人力資源轉向歐美及香港、新加坡、首爾等亞洲城市。

情境四，中東局勢險惡，衝擊全球經濟安全，中國內部亦因接棒情勢嚴峻，派系鬥爭，貪污行賄蠱漲，引發社會動盪不安，民主化聲浪盛起，經濟衰退，外資投入大幅減少，中國神話破滅，資金人才外移，國營企業斷絕中央控管，地方諸侯經濟再起，「*made in Jiangsu, not in China*」將是中國各地區彼此競爭、向外連結、尋求地方自治的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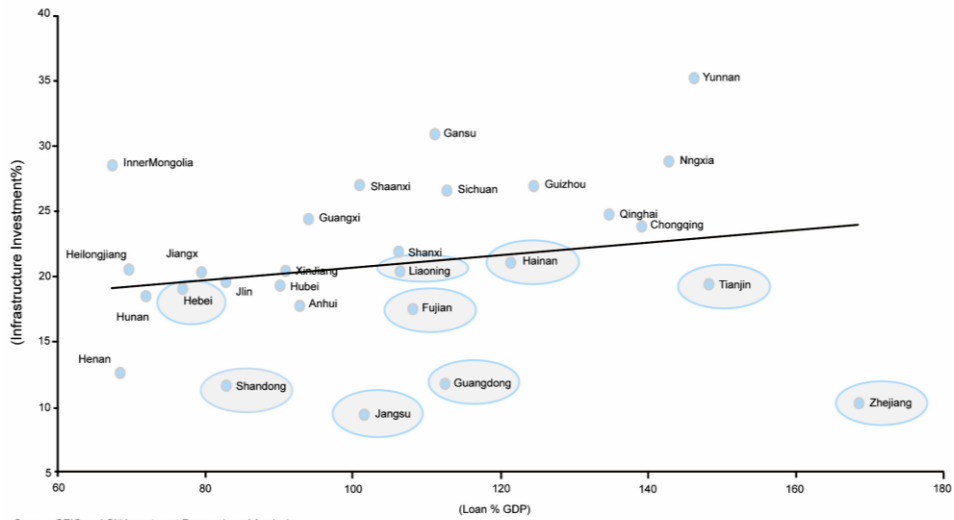
本文利用情節分析推演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目的不在精準預測政經局勢的演變，而是要藉由影響政經發展的關鍵內外部因素：內部經濟轉型與外部國際景氣發展作為中國經濟未來的四象限分析，更能清楚檢視經濟全球化發展下中國與國際的連結是透過產業分工體系、國際金融體系、人力資源流動、區域經濟整合等運行而提供中國崛起的契機。

當然更積極的面向是提供台灣政府及民間企業進一步了解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因素，並能在中國成長模式轉型中，以更宏觀的視野去檢視中國政府振興經濟政策的效果以及未來風險，評估中國貨幣金融手段能否真正達到金融改革的目的，經濟成長趨緩的硬著陸風險是否隱藏更大危機，人口結構轉變、城鎮化發展等對中國持續經濟成長的議題。

附錄一 中國地方基礎建設佔該區 GDP 比重

Domestic Dem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y Region

Potential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y Province



Source: CEIC and Citi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Analysis.
Note: Beijing (258.5% VS. 9.1% loan to GDP ratio), Shanghai (199% VS. 8.2%) and Tibet (59.5% VS. 51.2%) are not plotted here. Those blocked are coastal provinces.



附錄二 亞洲國家人口紅利

Impact of aging on growth, projection for 2011-2020 and 2021-2030

Economy	Variable	2011-2020 (percentage points of growth)					2011-2030 (percentage points of growth)				
		L/P	TFP	K/L			L/P	TFP	K/L		
				Indirect (through saving)	Direct	Total			Indirect (through saving)	Direct	Total
China, People's Rep. of	Youth	0.087	0.334	0.072	0.112	0.605	0.021	0.082	0.018	0.027	0.148
	Old	-0.209	-0.208	-0.121	0.089	-0.449	-0.434	-0.432	-0.251	0.184	-0.933
Hong Kong, China	Youth	0.085	0.327	0.070	0.110	0.592	-0.037	-0.143	-0.031	-0.048	-0.260
	Old	-0.319	-0.318	-0.185	0.136	-0.686	-0.891	-0.887	-0.516	0.378	-1.915
India	Youth	0.159	0.615	0.132	0.206	1.113	0.122	0.471	0.102	0.158	0.853
	Old	-0.072	-0.071	-0.041	0.030	-0.154	-0.160	-0.159	-0.093	0.068	-0.344
Indonesia	Youth	0.117	0.453	0.098	0.152	0.819	0.090	0.348	0.075	0.117	0.630
	Old	-0.125	-0.124	-0.072	0.053	-0.268	-0.206	0.205	-0.119	0.087	-0.442
Korea, Rep. of	Youth	0.112	0.431	0.093	0.145	0.780	0.011	0.041	0.009	0.014	0.074
	Old	-0.407	-0.405	-0.235	0.173	-0.874	-0.708	-0.705	-0.410	0.301	-1.522
Malaysia	Youth	0.142	0.549	0.118	0.184	0.994	0.095	0.369	0.079	0.124	0.667
	Old	-0.162	0.161	-0.094	0.069	-0.349	-0.274	-0.273	-0.159	0.116	-0.589
Pakistan	Youth	0.169	0.651	0.140	0.218	1.178	0.133	0.512	0.110	0.712	0.927
	Old	-0.048	-0.048	-0.028	0.021	-0.104	-0.069	-0.068	-0.040	0.029	-0.147
Philippines	Youth	0.157	0.606	0.131	0.203	1.097	0.111	0.430	0.093	0.144	0.779
	Old	-0.117	-0.117	-0.068	0.050	-0.252	-0.160	-0.159	-0.093	0.068	-0.344
Singapore	Youth	0.152	0.586	0.126	0.197	1.061	-0.016	-0.061	-0.013	-0.021	-0.111
	Old	-0.540	-0.537	-0.312	0.229	-1.160	-1.119	-1.114	-0.648	0.475	-2.406
Taipei, China	Youth	0.140	0.539	0.116	0.181	0.976	0.032	0.123	0.026	0.041	0.222
	Old	-0.323	-0.321	-0.187	0.137	-0.694	-0.815	-0.812	-0.472	0.346	-1.753
Thailand	Youth	0.068	0.262	0.057	0.088	0.475	0.011	0.041	0.009	0.014	0.074
	Old	-0.184	-0.183	-0.107	0.078	-0.396	-0.434	-0.432	-0.251	0.184	-0.933
Viet Nam	Youth	0.214	0.826	0.178	0.277	1.494	0.058	0.225	0.04	0.076	0.408
	Old	-0.014	-0.014	-0.008	0.006	-0.030	-0.320	-0.318	-0.185	0.136	-0.687

資料來源：ADB (2011)。

附錄三 中國未來經濟改革方向

改革理論	改革方向
中國改革 的理論 架構 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p>國企改革：加速放寬民營進入上游產業，讓市場開放程度增加，打破政府和國企業資源的壟斷。</p> <p>金融改革：設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問題，並加速利率自由化，及增加直接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與規範。</p> <p>對外政策：積極鼓勵企業走出去，以增加資本市場的國際化與開放程度，並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發展低碳經濟以及加速人民幣國際化。</p>
誘因機制的重建	<p>農村改革：採取更全面性的財政改革、增加農民收入與社保，提升農民福祉。</p> <p>農企改革：建立完善的誘因機制與監督機制，以解決代理人與國有企業腐敗現象。</p> <p>國銀改革：完善誘因機制改善國銀績效。</p> <p>財稅改革：持續進行結構性減稅，促進結構升級，並且完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降低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誘因。</p>
產權制度的變革	<p>農村改革：完善土地流轉制度，保障農民的權益。</p> <p>國企改革：落實明晰產權，明確界定國企的實權，並且做到政、企分離。</p> <p>國銀改革：明確界定國銀的責權，並且做到政、企分離。</p> <p>財稅改革：明確劃分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讓財政分權改革進一步深化，分稅制精神進一步體現。</p>

資料來源：鄭翰亮、吳智鳴（2012）。

參考書目

- 丁霞，2012。〈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與創新〉《江漢論壇》1月，頁59-63。
-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2013。《關於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與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的報告》。中國北京：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
-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統計資料庫〉（<http://www.stats.gov.cn/tjsj/>）（2013/2/21）。
- 行政院主計處，2013。《國情統計通報》第035號。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吳寄南，2012。〈日本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的路徑選擇及趨勢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5卷5期，頁103-11。
- 李迅雷，2012。〈對中國經濟悲觀的深層原因〉《華爾街日報中文版》6月26日（<http://cn.wsj.com/gb/20120626/LXL084734.asp>）（2013/1/30）。
- 林吉琳、翁嘉禧，2011。〈外資引進效果與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31個省市的實證分析〉《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3期，頁79-93。
- 胡鞍鋼，2012。〈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領頭羊”—基於歷史和國際兩個視角的分析〉《紅旗文稿》19期，頁8-13。
- 陶冬，2013。〈中國經濟六大懸念〉《中國評論新聞網》2月4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4/2/8/7/102428750.html?coluid=50&kindid=1076&docid=102428750>）（2013/2/21）。
-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課題組，2012。〈2012-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再展望〉《廈門大學學報》6期，頁94-101。
- 張曉波、楊進、王生林，2009。〈中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了嗎？—來自貧困地區的證據〉《浙江大學學報》9月，頁1-18。
-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2。〈面向2020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經濟研究參考》43期，頁4-34。
- 溫芳宜，2013。〈中國內需發展議題〉《經濟前瞻》1月，頁29-34。
- 劉金全、馬昕田、劉漢，2012。〈中國“十二五”初期經濟周期波動態勢分析〉《社會科學戰線》8期，頁57-62。
- 盧鋒、陳建奇、楊業偉，2012。〈減速與調整：全球宏觀經濟形勢研判〉《國際經濟評論》6期，頁20-56。
- 蕭興志、彭宜鍾、李少林，2012。〈中國最優產業結構：理論模型與定量測算〉《經濟學季刊》12卷1期，頁136-62。
- 聶輝華、鄒肇芸，2012。〈中國應以“人口紅利”轉向“制度紅利”〉《國際經濟評論》6期，頁124-35。

- 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 (編) , 2012 。《世界投資報告》。中國北京 : 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 (<http://219.235.129.58/reportYearQuery.do?id=2100&r=0.35188680432482744>) (2012/9/7) 。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1 Update-Preparing for Demographic Transition*.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2.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2*. Jakarta: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2005.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pp. 34-52.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 Das, Mitali, and Papa N'Diaye. 2013. *Chronicle of a Decline Foretold: Has China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Washington, D.C.: IMF.
- Huang, Yasheng. 2005. "The Rise of China: Impact on the Re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5 International Forum on Prospects in Asia --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aipei, December 13.
- Lee, II Hounq, Murtaza Syed, and Liu Xueyan, eds. 2012. *Is China Over-Investment and Does it Matter?* Washington, D.C.: IMF.
- Wang, Guogang. 2010. "Urbanization: Focu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 12, pp. 43-59.
- Wikipedia. 2012. "Hard Land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d_landing_\(economics\)](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d_landing_(economics))) (2013/6/11)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Yu-ying Teng

*Lecturer, Graduate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sis the key factors of China's transposition to the consumption-driven model to keep it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stead of export-led and investment-led growth model, five prospects for altering the consumer-led model that has targeted in China's 12th Five-years Plan are crucial: uncertain effects of economic revival policies, financial risk of monetary polices, puzzle of hard landing, declin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nstability of urbanization. Furthermore, continuing rapid growth will enhance China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China, economic growth model, consumption-driven model, regional integration